

# 逃离奥斯维辛

## Auschwitz

[匈牙利] 米克罗斯·尼兹利——著 周仁华 孙志明——译

在黑暗中，人性的考验、生死的抉择，  
在希望的头便是希望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逃离奥斯维辛

## Auschwitz

[匈牙利] 米克罗斯·尼兹利——著 周仁华 孙志明——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奥斯维辛 / (匈) 米罗斯·尼兹利著; 周仁  
华, 孙志明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354-9672-0

I. ①逃… II. ①米… ②周… ③孙… III. ①自传体  
小说—匈牙利—现代 IV. ①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9815 号

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 By  
MIKLOS NYISZLI  
Copyright: ©1960, 2011 BY MIKLOS NYISZL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kyhorse Publishing,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策划编辑: 陈俊帆

责任编辑: 彭姗姗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0 千字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序 言

为本书作序，我是有所犹豫的。毫无疑问，《逃离奥斯维辛》是一部诚实而且重要的作品。书中讲述的事件，尽管让人毛骨悚然，但有必要一讲再讲，直到其现代意义深入人心。尽管作者已有声明，但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指出：这不是一本医书。其他医生也写过一些书，讲述他们在集中营中的见闻。譬如，心理医生维克多·弗兰克尔也写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没有帮助党卫军在人体上做过实验；他并没有滥用职业身份，加入所谓“邪恶医生”的队伍（“邪恶医生”的说法的确恰如其分）。他不但没有帮助党卫军医生杀人，还蒙受了作为人类一分子的痛苦。在谈起个人经历时，他曾引用赫贝尔的话说：“除非你压根没有需要丧失的东西，否则那里发生的事，一定会让你丧失理智。”尼兹利医生的同事之一，的确就丧失了理智。对他丧失理智经过的描写，是本书最为感人的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让人最为释怀的情节。过去有丧失理智的人，现在仍然会有，只要有足够理由这么去做。

其他人没有丧失理智，这是因为，跟弗兰克尔医生一样，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他们并不甘心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选择跟命运抗争。尼兹利医生非常恰当地，将大部分篇幅用在了对第12批特遣队的描述上。他们是在毒气室工作的囚犯，在所有特遣队中，他们是唯一一支在生命最后几天得以恢复自由、并在生命终结当天再次获得自由的特遣队。因此，他们的生命虽然逝去，但他们是勇敢的“人”，而不是懦弱的“行尸”。光是这支特遣队的故事，就足以使本书成为一部重要文献。但是，这批特遣队的命运，却引发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总共14批特遣队，只有这一批选择了反抗呢？为什么其他特遣队会选择乖乖地自行走向死亡呢？为什么千千万万其他囚犯没有作出同样的反抗呢？显然，为数800多人的第12批特遣队的故事，是一篇关于灭绝集中营的英雄史诗，它促使我们恢复了对人类的信任。但是，这些特遣队员不过是做了我们期待所有人都应该做的事情而已，那就是：如果不能生，那就用死来尽可能削弱或阻碍敌人，甚至用自己行将就木的肉身来使灭绝行动变得不那么容易，或使之不再有那种可能，使之不再能够顺利开展。迄今，人们仍在审视这些特遣队员的故事。如果他们能够做到，那么其他人也同样能够做到。但为什么他们不去做呢？为什么他们白白舍弃自己的生命，而不去给敌人制造障碍呢？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礼物送给党卫军，而不是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甚或是关押在一起的囚犯呢？这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寻找答案留下了线索。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但我们都知道它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希望忘记它，因为

它压根就跟我们的价值和思想体系不相匹配。我们并不希望重塑这种价值和思想，而是希望忘记德国灭绝集中营的故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它压根就不曾发生。我们最能接近于相信这个故事的办法，就是不要再去想它，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勉力接受其噩梦般的场面。

人类的历史（譬如西方国家的历史）是一部充斥着宗教或政治迫害的历史。过去几百年里，大批人口遭到灭绝。德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曾在30年战争中失去大量人口。这场战争夺去了上千万平民的生命。如果两颗原子弹还不足以让日本投降的话，可能有千千万万日本人会遭到灭绝，就跟在德国灭绝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一样。战争让人感到恐怖，但人类对其同类的非人对待更加让人感到恐怖。然而，灭绝集中营故事的重要之处，不在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部分，而在于那些更加非同寻常、更加令人恐惧的情节。其重要之处，在于我们多了一个认识人类的维度，一个我们都想要忘却的那个方面。但忘记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尽管听来奇怪，但我想说的是，灭绝集中营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德国人在这里灭绝了上千万的人口（根据我们对人的了解，我们已经接受了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尽管几百年来，如此规模、如此冷血无情的大屠杀的确是史无前例），真正新颖、独特、吓人的，是数量如此之众的人，他们就跟挪威旅鼠一样，是自觉排着队走向了死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慢慢弄明白的事情。

奇怪的是，为我们打造理解这一现象之工具的人，是一位奥地利人。另外还有一位奥地利人，他让我们感觉责无旁贷、一定要弄明白其行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希特勒将千万之众送进了毒气室，在此之前若

千年，弗洛伊德就坚定认为：人的一生是一场持久斗争，是跟所谓“死亡本能”的持久斗争；我们必须将这些毁灭性冲动控制在限度之内，免得它将我们带往毁灭。毁灭倾向既存在于我们自身，又存在于整个社会。然而，20 世纪的到来，却消除了一度使这一倾向无法随意肆虐的古老壁垒。国家、家庭、教堂、社会，人们开始怀疑一切，并且发现这些概念全都各有欠缺，它们约束或疏导我们毁灭倾向的力量也因此遭到了削弱。尼采是希特勒的预言师，尽管希特勒跟其他人一样曾可怕地误解了他的思想。尼采曾经预言说，要想在以机器为特征的现时代中生存下去，西方人必须具备一些价值观，但对这些价值观的重新评估还没有完成。控制“死亡本能”的那些旧方法，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效力；同时，本应取而代之的新的、更高级别的道德观，却还没有得以建立起来。在新老社会结构（即人类过了时的内心结构和尚未完成的新结构）正在交替的空白期，没有剩余多少东西可以约束人类的毁灭倾向。于是，在这个时代，当他人的毁灭力量（譬如在希特勒当政的国家）开始泛滥成灾时，人类也就只剩下控制“死亡本能”的个人能力可以给他提供保护了。

不能主宰“死亡本能”的状态，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在那些自觉走向毒气室的灭绝集中营囚犯身上，它开始于“照常营生”。那些试图凭以往的职业身份为刽子手提供服务的人，譬如医生，即使他们不是在“照常营生”，也可说是在“照常生活”。以此方式，他们为自己打开了通往死亡的大门。

那些不“照常营生”、不帮助党卫军做实验、不帮助他们灭绝人类

的人，他们的反应迥然不同。有些谈起过去经历的人，他们会无奈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成天看到火化场在燃烧并闻到烧焦的人肉气味，他们怎么会去否认毒气室的存在？他们怎会仅仅出于预防，沦为为生存而战，而选择不相信灭绝行为的存在呢？譬如，伦杰尔（《五支烟囱：奥斯维辛的故事》，芝加哥：齐夫·戴维斯，1947）就曾经说，尽管她和她在狱中的同伴，就住在离火化场和毒气室几百码开外的地方，并且也知道火化场和毒气室是干什么用的，但几个月之后，多数囚犯还是否认知道它们的存在。德国的老百姓也否认存在毒气室的说法，但同样是否认，其含义却不尽相同。面对事实而奋起抗争的老百姓，他们只是自取灭亡而已。奥斯维辛的囚犯已经是在坐以待毙。奋起抗争能够挽救的，要么是反正都要失去的生命，要么是别的什么人的生命。当伦杰尔和其他很多囚犯被遴选出来送往毒气室时，伦杰尔得以成功逃脱，但其他人却并没有想这么做。更糟糕的是，当她第一次试图越狱时，跟她一道被遴选出来的其他犯人还叫来管理员，向他们告了密。对此情况，伦杰尔没有别的解释。她只是说，这些人对任何可能设法摆脱与他们相同命运的人都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们自己缺乏足够的勇气去冒险采取行动。我相信，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生存的意愿，从而任由死亡倾向淹没了自己。于是，他们就去跟执行毁灭倾向任务的党卫军套近乎，而不是去亲近那些仍然抱着活下去的念头、因而得以成功逃脱死亡的狱友。

然而，这只是放弃求生、不再抗拒“死亡本能”的最后一步而已。用更加科学的语言来说，所谓“死亡本能”实际就是惯性原理。因为早



在进入死亡集中营之前，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惯性，正是惯性，引导千千万万犹太人住进了党卫军专为他们设立的民族隔离区。正是惯性，使得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在被限制居住的时候，待在家里等着刽子手上门。那些没有被惯性所控制的人，他们将“限制居住令”看成是个警示信号，它表明是时候开展地下活动、加入抵抗运动或获取假身份证件了；以前没有做的，现在就得做了。这些人多数都得以幸存。另外，非犹太人中的惯性另有不同。他们所面临的，不是死到临头，而是接受压迫。屈从和否认盖世太保的罪行，对他们来说是求生的无奈之举。“剩余生存边际”降低了很多，但它的确存在。因此某种行为模式，在某些情况下，会让人得以幸存，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并不能做到。在德国人身上，那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行为模式；在犹太人和灭绝集中营中的囚犯（其中大多数仍然是犹太人）身上，那是一种自我欺骗模式。当囚犯们开始为刽子手服务，帮助他们加快自己同类的死亡时，情况就已经超出了简单惯性的范畴。那时，惯性之外，已经加入了肆掠成灾的“死亡本能”。

伦杰尔也说起过门格勒医生，他是《逃离奥斯维辛》一书的主要人物之一。门格勒医生是“照常营生”态度的典型代表，这种态度使部分囚犯（当然也包括党卫军）得以尽可能保持内心的平衡，不管他们当时在干什么。伦杰尔讲述了门格勒医生如何在为女人接生时采取各种妥当医疗预防措施的故事。譬如，他会严格遵循所有无菌消毒的原理，他会小心翼翼地剪断新生儿的脐带等等。但仅仅半小时之后，他就把母亲和新生儿一道送往火化场烧掉了。

同样是这种“照常营生”的态度，使得尼兹利当上了集中营的医生，使得尼兹利医生自愿给党卫军提供帮助。这种态度使得千万个犹太人前往民族隔离区谋生，不仅为纳粹干活，还帮助纳粹从犹太同胞中挑出他们想要的人选，把他们送进了毒气室。如果这还算不上是“照常营生”态度的话，那它至少也算是一种类似的态度，它使得华沙犹太民族隔离区的起义遭到推迟，最后到了差不多没有人手或没有兵力战斗的地步。当然，也因为人手太少的缘故，起义没能有所突破。起义要是成功的话，上万人的生命将因此得到拯救。

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历史，但相同的“照常营生”态度却仍在影响着我們。它试图使我们忘记两件事情：第一，跟我们同属 20 世纪的人，曾将万千之众送入毒气室；第二，千万个跟我们一样的人，曾毫无抵抗地走向死亡。在布痕瓦尔德（布痕瓦尔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一村庄，1937 年至 1945 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酷屠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中文译者注），我曾跟上千个在 1938 年秋天被安排带到那里的德籍犹太囚犯有过交谈。我问他们，既然情况如此羞辱、如此充满歧视，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选择离开德国？他们的答案是：我们怎么能忍心离开呢？离开意味着放弃家园、放弃我们赖以营生的地方。他们占有凡世之物，但却反被凡世之物所累，以至于根本无法搬迁；他们不是去利用这些财产，而是被这些财产所控制。事实上，反犹太的歧视性法律，本就是要迫使他们离开德国，让他们将财产留下。长期以来，纳粹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他们不想要的少数民族（如犹太人）走上迁徙之路。只是在这一办法并不奏效的时候，他们才启动了灭

绝政策，并随后推出了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以及后来的外国侨民，他们怎会甘愿接受被灭绝的现实？说他们甘愿接受被灭绝的看法，是不是也源于纳粹们想要弄明白，在不反抗的情况下，犹太人会甘愿接受多大程度的羞辱呢？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在没有暴力反抗的情况下，一步一步逐渐恶化起来的。有可能，正是犹太人对日渐严厉的歧视和羞辱的逆来顺受，让党卫军产生了一个想法，觉得可以放心到让他们自行走向毒气室的程度。波兰的多数犹太人，他们不相信“照常营生”，并因此得以在二战中幸存下来。当德国人逼近的时候，他们抛下一切身家，逃到了俄罗斯。在那里他们或许只是二等公民，但至少还是被当作人来加以对待。那些留下来“照常营生”的犹太人，他们走向了通往自我毁灭的道路并最终不幸殒灭。因此，就其最深层的含义而言，走向毒气室，只是“照常营生”哲学的最终后果。的确，同样的自杀行为还别有它意。它意味着，人之被逼无奈，不过如此，除此之外再不可能更为恶劣；它意味着，超出某个点，他就会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忍受非人生活。然而，通往这一可怕选择的最初一步，就是之前出现的那种惯性。

《安妮·弗兰克日记》（《安妮·弗兰克日记》，是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德国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写成的日记，记录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作者的经历，成为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出版后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1999年安妮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中文译者注）发行后在全球取得了广泛成功。关于该书的书评，可以突

出强调我们认购“照常营生”哲学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样的哲学会加速我们的毁灭。那样一个温情脉脉、感人肺腑，在温柔的安妮·弗兰克心中激发出那么多怜悯之心的故事，要把它解构开来，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我相信，除非承认我们此举是想要忘却毒气室、是想要美化屠杀之际还得过且过“照常营生”的态度，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安妮的故事会在全世界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当安妮一家准备被动躲藏起来的时候，在荷兰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上万名犹太人正试图逃奔到自由世界，或者最好能够跟捕杀他们的刽子手殊死搏斗。其他无法这么做的人，就“转入地下”。“转入地下”的意思不仅仅是躲避党卫军，也不是被动等待，也不是不为被捕的那一天做抗争准备，而是要对抗德国人，为人类的命运而战斗。安妮的全家人，他们想做的，不过是按以往方式，尽可能继续苟活而已。小安妮也只是想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她有这样的想法，自然无可厚非。但她的一生连寿终正寝都谈不上，更没有什么英雄壮举可言。她的一生是无意义的一生。安妮一家本可以面对现实而得以幸存，跟生活在荷兰的很多犹太人一样；安妮本来有很大可能会活下来，跟荷兰的许多犹太儿童一样。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她需要跟自己的父母分开，住到荷兰人家里去，装作是他们的孩子。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转入地下”最难的方式是家庭方式；以家庭方式藏身，最有可能被党卫军察觉。安妮一家在非犹太人荷兰家庭中有很好的入缘，他们本可以轻松地分头藏身，分住到不同的家庭中。然而，他们并没有做这样的打算。他们的计划，主要原则是，要尽可能继续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其他方案，对他们来说，不仅

意味着要放弃他们所珍惜且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而且还意味着要接受人对人实施非人待遇这样一个现实。最重要的是，这将迫使他们接受这样一个观念：“照常营生”不是个绝对价值观，但它有时却会成为所有人生态度中最具毁灭性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有能力取得那么多资源的安妮一家，如果有意的话，是完全可以弄到一两条枪的。他们本可以至少打死一两个前来抓捕他们的党卫军士兵。党卫军士兵并非数不胜数。每抓捕一个犹太人，就让他损失一名党卫军，这么做本可以显著妨碍这个警察国度的运行。安妮一家的命运本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除了安妮的父亲以外，他们再怎么样还是死了，尽管安妮的父亲并不希望用他全家的灭绝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他们本来可以死得更有价值，而不是乖乖走向死亡。

这部成功的作品，以安妮表达对人性本善的信仰而结束，这样的结尾自然有它的道理。接受毒气室的真实存在，以使它今后不再存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但这本书却刚好否认了毒气室的存在。如果人性大体上都是善良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自己的至亲还活着，就是天底下最让人羡慕的事情的话，那我们的确就都可以像往常那样过日子，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置之脑后了。只可惜的是，安妮死了，但她的父母却根本无法相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安妮的故事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本书同样含蓄地否认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如果人都是善良的，那么就不可能有奥斯维辛集中营。

我接触过很多犹太人和非犹太反纳粹人士，他们得以在德国和被占领国中幸存下来，但他们都意识到，在世界分崩离析的时候，在暴虐大

行其道的时候，人不能继续“照常营生”。那时，他必须彻底地重新评估自己的行为、信仰和立场。简而言之，他必须确定自己在新现实中的立场。这个立场必须是坚定的立场，而不该是退避三舍、不管不问。

如果今天有警察要捍卫种族隔离制度，而非洲黑人顶着警察的枪口开展游行，虽然他们中上千之众会遭到射杀，上万之众会被关进集中营，但他们的游行、他们的抗争，或早或迟会确定无误地给他们带来自由和平等。欧洲的犹太人同样可以以自由民之身去开展游行、反对党卫军，而不是做出先是卑躬屈膝、后是束手待毙的举动，最后乖乖自行走向毒气室。他们被动等待党卫军来敲门，而不是首先弄到一杆枪，在自己被射杀之前，先下手射杀至少一名党卫军。这才是他们乖乖地自愿朝着“帝国火化场”迈出的第一步。

尽管引起我注意的其他有关集中营的讲述，都是由那些从未甘愿为党卫军服务的人所做。因为即使是在奥斯维辛这样一个令人感觉非常压抑的环境里，某些防御机制仍在为“生存本能”而非“死亡本能”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的内部世界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对此有了足够的理解，个体就不会再去自欺欺人地认为：拯救这副皮囊，跟拯救全部自我，是同一码子事。他就能够承认，大多数表面上似乎具有保护性质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带有自我破坏的效果的。

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是那些主动报名到毒气室工作的囚犯，他们希望能够借此挽救自己的生命。不久，他们就全部遭到了杀害，而且很多人比没有报名的其他囚犯死得更早，而且还是在经历几个星期更为恐怖的生活之后。

这种方式就是以职业技能为自豪，而对技能用于达到的目的不闻不问。尼兹利医生、门格勒医生和其他上千位更为著名的医生，他们都是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接受医学培训的人，但却成了人体实验及其附带伪科学调查的参与者——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置道德于不顾、纯粹以职业技能和知识为自豪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感觉。现代社会正在向技术能力型社会发展，对职业技能和知识的自豪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这种感觉将继续与我们同在，尽管已经没有了集中营，没有了火化场，没有了以种族为由对万千之众施行灭绝的做法。奥斯维辛集中营没有了，但只要那种置道德于不顾、单纯追求职业技能和知识自豪感的态度仍然存在，我们就免不了再遭被伤害的命运，因为这种态度的核心是对生命可耻的无视。

我推荐大家去认真阅读的内容，包括书中对每位新来特遣队员完成首项任务经过的描写，就是要他们去焚化几小时前刚刚被灭绝的前一批特遣队员的尸体。我也建议大家去猜想一下，虽然第12批特遣队有奋起反抗之举，但为什么第13批又选择毫无反抗地默默走向死亡呢？

在第12批特遣队实施的唯一一次反抗中，他们杀死了70名党卫军，包括一名军官和17名士官；他们彻底摧毁了一个火化场，并严重损坏了另一个火化场。当然，全部853名反抗者都付出了生命。但这一情况证明，特遣队员的职务给了囚犯们一个以10换1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去消灭党卫军，这个比率可比普通集中营的要来得高。那个奋起反抗、给敌人造成重创的特遣队，他们的死法跟别的特遣队没有多大不同。那么，为什么呢？这是萦绕在所有灭绝营研究人员心中的一个问

题。前一批特遣队员成功地摧毁和破坏了死囚处决室，杀死了相当于他们数量 10% 的党卫军。在眼前就有榜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万千之众还是要毫不抵抗地在沉默中去主动送死呢？为什么，这么多囚犯，却极少有人，像唯一一批英勇反抗的特遣队员那样，死得有点血性呢？

因此，这本书尤其应视为一部经世警示之作。千方百计委曲求全者，反有百死之虞；奋力一搏拼死求生者，反有长命之幸。

布鲁诺·贝托汉

芝加哥大学

1960 年 5 月



## 前 言

本书描述的事件，让人近乎难以想象，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希特勒统治德国的 12 年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光。尽管人们竭尽所能，想要确保不要忘却这段历史，但事实是，有过纳粹集中营经历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出面作证。历史会不可避免而又残酷无情地，将个人分解为“非个人”，将个体融入集体，将眼前变成遥远。纪念碑和博物馆，无论它们多有说服力，都永远不能真正或完全传递真实的体验。这是米克罗斯·尼兹利医生的书，在成书 60 多年、付梓 50 多年之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它的首度问世，是在《现时代》，那是让—保罗·沙特的书评月刊。关于这一话题，出版最早的图书之一，就是《逃离奥斯维辛》。该书出版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想知道，死亡集中营里每天都在真正发生些什么。尽管作者的立场，存在道德观不够明朗的问题（布鲁诺·贝托汉在他颇富说服力的前言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正如《纽约书评》在评论有关这一话题